



丘遲甲文集

丘应甲文集

主 编 丘晨波

副主编 黄志萍 李尚行

编 委 丘应枢 廖三端 马汉彦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丘逢甲文集

丘晨波 黄志萍 李尚行等编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5插页 320,000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794-4

I·1576 平装定价: 15.00元

精装定价: 20.00元

《近代岭南文学名家书系》出版说明

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岭南作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以创造性的精神，丰富的作品，从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反映了中国从封建末世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嬗变，揭露和批判了旧中国的腐败和黑暗，宣扬了民主思想和革新进取精神。他们的作品和著述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为了丰富岭南的文化积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搜集和整理近代岭南在文学上卓有成就、影响较大、有历史地位的名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著述，编辑成卷，定名为《近代岭南文学名家书系》陆续出版。

本书系之各文集，力求全面反映每位名家一生的创作实践，体现其创作风貌和学术造诣。各家卷数从其创作实际出发，有的一人一卷，有的多人合编一卷，有的则一人多卷。所收的作品和著述，均以最早的版本或最好的版本为底本，参酌其他版本进行校勘。为了保存原作的面貌，除了校正一些书名、人名、地名和错字、衍字、脱误外，对原刊本原文，不作任何删改。为了避免烦琐，亦不书校记。如遇有个别人名和地名，疑为错误的，而一时又无法稽查，均于原文后用括号加以注明。凡原书刊有眉批或评语者，悉予保存，不作删削，以仍其旧。各书的原版都是用繁体字，现在一律改用简化字，并一律使用新式标点。

花城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前 言

丘逢甲（1864—1912）又名仲阉，字仙根，号蛰庵，晚年更名仓海，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族志士、爱国诗人和教育活动家。他出生于台湾苗栗县一个乡村教师家庭，自幼聪颖勤奋，博学能文。他十四岁中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他不愿做官，中进士后即归里从教。他关心时事，鉴于民生凋敝，列强侵略，国势衰危，他深为忧虑，毅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放眼世界，努力吸收新思想和新知识，谋求祖国富强之道；同时也向台湾官民反复宣传，呼吁抵御外侮。

甲午战起，丘逢甲以“抗倭守土”号召乡里，积极筹建义军。清廷割台让日，他刺血上书，誓死抗争，在外援断绝、强敌压境的艰危形势下，力倡自立自救，率领义军抵抗强敌。乙未抗日事败，丘逢甲内渡返回祖籍广东镇平（今蕉岭县），继续以强国复台为职责，为救亡图存，唤醒民众，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他在粤东潮嘉地区大力兴办教育，认为“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主张以教育广开民智，振奋民气。他创办的汕头岭东同文学堂等校培育了一批爱国志士。1906年起，丘逢甲先后出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广府中学堂监督和广东省教育总会会长，发展省垣教育。1909年被举为广东咨议局副局长兼两广总督公署议绅及两广方言学堂监督。在此期间他力主禁赌禁烟，为民兴利除弊，并礼聘革命党人朱执信（当时名史大符）为两广方言学堂监学，还对

参加革命活动的爱国青年暗中予以保护。

辛亥首义前后，丘逢甲配合革命党人促成广东和平独立，出任广东省军政府教育部长。旋以广东代表资格，赴南京出席独立各省组建临时中央政府会议，并被举为中央参议院参议员。1912年2月25日，丘逢甲不幸病逝于祖籍镇平县（今蕉岭县）淡定村。

丘逢甲生活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处于瓜分豆剖的危难年代。他爱国爱乡，奋起抵御外侮，为抗日保合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记取乙未抗敌事败的沉痛教训，随着时代进步，逐渐由拥护变法维新进而同情和支持民主革命。他毕生以强国、御侮、复台为己任，临终仍念念不忘“葬须南向”，热切期待着祖国的统一与富强。丘逢甲一生的业绩与活动，表现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大无畏精神。

由于资料匮乏，有关丘逢甲生平思想活动的具体研究，还不够广泛、深入，并存在若干疑点和难点，也导致了学术界对某些问题如“卷饷内渡”之说的分歧。为了给开展丘逢甲的学术研究尽可能多地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也为了有利于保存和弘扬这位近代爱国志士的诗文遗产，多年来我们对他的遗诗遗文进行了多方的探究搜索，现加以整理编校，汇编为《丘逢甲文集》，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集收录丘逢甲部分诗作和遗文。

丘诗现存《柏庄诗草》及《岭云海日楼诗钞》两本诗集。前者系丘氏青年时期的作品，1979年发现，1980年在北京印行。后者曾分别由安徽、上海等地出版社刊布新版。此外还有若干佚诗。今据此三者选录600余首，并详加系年，大体可见丘氏诗作的风貌和精华。

丘逢甲的文稿，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今已散佚大半。据诗人之子丘察（念台）回忆：“公之著述，在乙未以前者，

以遭台湾兵燹，诗文均无存；即在乙未以后，亦仅诗有辑稿，而文则无之，其他楹联小品，则更无论矣。盖公幼即喜诗，故于诗稿常自编存，于文稿、函稿则散置不辑。”丘逢甲内渡前所写的残存文稿，只有应试策论等文，曾由在台湾的丘氏后人加以辑刊。此外丘逢甲的门生丘冬友于1943年曾辑编《丘仓海先生文集》（蕉岭联和印务局刊印），所收遗文仅十余篇，且限于当时条件，讹误甚多。八十年代初，本书编者中的丘应枢、丘展波、黄志萍在整理校勘《岭云海日楼诗钞》时，在丘氏手稿中发现了少量幸存的文稿、信函，遂注意收集。在散居海内外的丘逢甲后人和丘逢甲研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共得丘氏文稿60余篇。今选刊47篇，并以体裁分辑，分为：（1）函电类；（2）序跋类（包括碑记、缘起、启、后记）；（3）传、铭类（包括寿序、谏、像赞）；（4）杂文；（5）日记（片断）等。丘氏文稿多系蝇头草书，甚难辨认，且时隔久远，纸质黄脆，给辑校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再加上我们水平有限，虽尽力而为，恐仍难免疏误，敬请专家学者予以教正。

二

丘逢甲六岁即开始学写诗，聪颖过人，文思敏捷。他自述：“弱冠以前，童心未化，词源滚滚，不择地以出。或一日赋万言，一夕成诗百首，人咸诧曰才，亦辄自信曰才。既而悔之，始一出于矜慎而伫兴，即就之作遂稀。”（《景忠祠题壁后记》）

甲午战起，丘逢甲亲历了抗敌护台的斗争烽火，备受亡国丧家之痛，内渡后又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苦，创作上则刻意“求真”，这种独特的生活际遇和强烈的心理感受，既淬砺了他的思想意志，也陶冶了他特有的诗歌风格：苍凉沉郁中腾跃着英气，雄强激宕而又明朝自然。诚如江山洲所说：“诗本其夙昔所长，数十年来复颠顿于人事世故，家国沧桑之余，皆足以锻炼而

淬砺之。其所为诗尽苍凉慷慨，有渔阳参挝之声，又如飞兔腰袅，绝足奔放，平日执干戈、卫社稷之气概，皆腾跃纸上。故诗人之名，震动一时。”（《丘逢甲传》）

通览丘逢甲的诗作，其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抒写爱国思乡之情，表达誓死复台之志。

诗人在台湾出生长大，对故乡素有深挚感情；内渡后万感齐集，积愤难遣，“百事不能能执笔”，无论是放怀山水，还是回首往事，丧土亡家之痛使他寝食难安，对乡亲故旧的深情眷念，令他日思夜梦，痛断肝肠。岭南的山川风习，与台岛本无多大差异，这更勾起他怀乡的幽愤情思。每当沐浴明月清辉，或目睹北雁南归，他倍感飘零、离乱之痛（《对月书感》、《东山感秋词》、《天涯》、《愁云》）。遇到年节或春回大地之际，诗人这种怀乡思亲、欲归不得的感情就更为强烈：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春愁》

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

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渡银洋。

——《元夕无月》

诗人自恨回天无术。他诅咒苍天不公，发出“神媧抑何心，补天不补地？”“诸仙各神通，坐视果何意？”的责问，借诘怨神仙来抒泄自己对腐朽清廷之愤懑。他，恨不能将无尽的哀思和未酬的壮志化作“怒涛”、“利剑”，“涌东海”，“没鳌山”，“斩长蛇”，“屠饿蛟”，为收复故国山河而重着戎装，完成未竟之事业。即使病魔缠身，他也牢记国耻国仇，嘱咐友人：“所须药物是当归，有客天南叹式微。未报国仇心未了，枕戈重与赋无衣。”（《病中赠王桂

山》)他担心的是古老中国的命运:“欲寻越井岗头艾,多恐神龙病已深。”(《鲍姑祠》)

“丛菊空留他日泪,故园烽火未曾收”。内渡后,丘逢甲一直记挂着台湾人民的抗敌斗争,义军当年浴血抗战的悲壮情景历历在目,家乡沦亡的深沉哀痛时袭心头。《愁云》一诗再次记述了诗人痛苦郁愤的情感:

愁云极目昼成阴,飞鸟犹知恋故林。
破碎河山收战气,飘零身世损春心。
封侯未遂空投笔,结客无成枉散金。
梦里陈书仍痛哭,纵横残泪枕痕深。

非常可贵的是,丘逢甲并没有被这种浓重的哀愁所压倒,他始终不忘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的神圣目标,丘逢甲不仅赋诗自励,恳请友人向乡亲们转达自己的决心;而且想方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系,互通音问,相互激励;并谆谆叮嘱家乡人民永远心系祖国,共谋中华的统一。在《送颂臣之台湾》一诗中,诗人深情写道:

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
全输非定局,已溺有燃灰。
弃地原非策,呼天讵见哀。
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

王气中原在,英雄识所归。
为言乡父老,须记汉官仪。
故国空禾黍,残山少蕨薇。
渡江论俊物,终属旧乌衣。

丘逢甲深信，“四万八千户，将完玉斧功”（《十四夜月》），只要大家同仇敌忾，坚持斗争，“生作愚公死精卫，谓海可塞山能移”（见《庐山谣答刘生芷庭》），那么，终有一日台湾就能回归祖国，一个统一、独立、光明的新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

海外阴晴终有定，人间圆缺古难全。

重完破碎山河影，与结光明世界缘。

——《羊城中秋》

二、揭露列强侵略，警醒国人救亡。

丘逢甲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动荡的历史年代，世界资本主义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力图奴役其他民族，掠夺殖民地，以获得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列宁语）在清政府腐败统治下，地大物博而国势日衰、人口众多却民心涣散的旧中国，势必成为列强掠夺的重点对象。特别是甲午战败，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阵阵狂潮，炎黄子孙沦为亡国奴的危机空前严重。丘逢甲对此有较清醒的认识，时时为祖国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忧虑。眼见日本得陇望蜀，据台后又垂涎闽粤，他警醒国人毋忘日本的新阴谋（“有人图写闽山去，着色争夸势力圈”）。得悉辽东、九龙、胶州湾相继被俄、英、德三国侵占，他愤作《岁暮杂感》、《九龙有感》、《闻胶州事书感》等诗予以揭露，发出浩叹：“祇庙屡闻生愤火，蓬山又见起边尘。青州酒断愁难遣，黄海舟迟信未真。慷慨出门思吊古，田横岛上更何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诗人作《述哀》以泄忧愤。面对“海上纷来九头鸟”、“九州无处不胡尘”的危急形势，忧心如焚的丘逢甲认为沙俄在甲午战后即出兵东北，占我旅大，染指新疆，强筑中东铁路，威胁最大，“多恐中原见鹞章”，若不抓紧自强力御，后果不堪收拾：

九边烽火迫金台，客唱新添塞上哀。

更筑长城防不得，鹭章南下老羌来。

——《题康步庵中翰出塞集》

历史证实了诗人的预见，沙俄确是瓜分旧中国的罪魁之一。

资本主义列强不仅霸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且肆意进行经济文化侵略，既破坏了我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摧残了新兴民族工商业的幼芽。中国的大量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横遭掠夺，白银外流，国势日衰，黎民苦不堪言。在《汕头海关歌》中，诗人满怀悲愤，尖锐揭露了列强宰割旧中国的种种惨状，诸如海关大权旁落（“新关主者伊何人？短衣戴笠胡羊鼻”），洋货与毒品充斥中国市场，以及民族工商业备受打击（“日日洋轮出入口，红头旧船十九废。土货税重洋货轻，此法已难相抵制”），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帝国主义者还残酷榨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诱骗青壮年出洋，使他们沦为“猪仔”、奴隶，其惨状目不忍睹：

以其货来以人往，人艙迫窄不能位。

岁十万人出此关，倭指来归十无四。

十万人中人斃半，载往作工仰喂饲。

可怜生死落人手，不信造物人为贵。

中朝屡诏言保商，惜无人陈保工议。

我工我商皆可怜，强弱岂非随国势！

外国的经济文化侵略与渗透，加速了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过程，沿海商埠畸形繁荣，淫靡之风日盛，不少人“醉生梦死恣行乐”，近海城镇出现了“江头日日呼画船，珠歌翠舞年复年”的颓靡景象。在《澳门杂诗》、《九龙有感》、《香港书感》、《珠江书感》等诗篇中，诗人描述了殖民统治下光怪陆离的社会现

状，表达了对“珠江风月漾胡尘”、“酣梦人心久散沙”、“神州莽莽将陆沉”的陵夷国势的无限悲愤，发出了“思之应下哀时泪”和“热血苦难消”的深沉感叹。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重大事件，丘诗都有反映。代表作如《汕头海关歌》、《海军衙门歌》、《述哀答伯瑶》、《岁暮杂感》、《闻胶州事书感》等，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尖锐矛盾，与黄遵宪同类题材的诗篇一样，具有诗史的价值，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苦难与耻辱，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教材。

三、抨击清廷腐败，主张变法图强。

对清廷弃台卖国的可耻行径，丘逢甲早已郁愤不平，内渡后见吏治日暗，国事日非，更不禁万感交集，抚今追昔，常借凭吊民族英烈来寄托自己报国无门、忠良受抑的忧愤情思（其中礼赞文天祥之作，如《凌风楼怀古》等诗，即有数十首）。诗人对权奸污吏以人民血泪尸骨换取功名利禄的无耻行径至为痛恨。在《海军衙门歌》中，诗人满含悲愤，辛辣鞭撻了他们卖国媚外、借机营私的卑劣罪行：

我不能工召洋匠，我不能军募洋将。
衙门沉沉不可望，若有人兮坐武帐。
早知袁也实不力，何事挥金置兵仗？
战守无能地能让，百万冤魂海中葬。
购船购炮仍纷纷，再拼一掷振海军。
故将逃降出新将，得相从者皆风云。……

庚辛之后，丘逢甲从一系列惨痛事变中逐渐认识到，山河破碎、国衰民穷有更深刻的原因，绝不限于地方吏治之黑暗苛虐，根源在于整个上层集团已经腐败衰颓，病入膏肓，难以救治。为官者，“一官便具奴才性”，朝廷则“伺人怒喜为怒喜，不知国仇况国耻”，对外屈辱求和，推行卖国外交，对内则敲骨吸髓，残杀

民众（“同一国民民教异，昨日义民今日匪”）。皇室贵族骄奢淫逸，腐朽至极。他们为了搜刮民脂民膏，竟借筹措海防经费的名义，派大员赴粤主持开赌，收取赌餉。针对这种祸国殃民的肮脏措施，诗人在《纪事》中曾给予愤怒的鞭挞：

何止诛求在市租，上供只道急军需。

相公南下纤筹策，报国居然仗博徒！

对于官场中那些贪婪歹毒，吮吸民血的“蝎”、“蝇”、“虱”、“蛆”之流，诗人于深恶痛绝之余，曾作《虫豸诗》、《新乐府》予以讽刺。“后庭玉树仍歌舞，前席苍生付鬼神”（《秋兴次张六士韵》）；“梦回黄屋无真帝，泪洒朱崖有弃民”（《叠韵答颖之》）。丘逢甲对清朝皇帝终于绝望，到了晚年他终于把视野投向新兴社会力量，在政治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四、同情人民疾苦，赞成民主革命。

内渡初，丘逢甲身为布衣，又受劣绅挤压，较前接近下层（“湛身难诉遗民苦”，“四海无家独卖文”）。那时，清政府为支付历次战争失败后的大量赔款，把沉重负担转嫁到国内各族人民头上，巧立名目，强征暴敛，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兼水利长年失修，水旱灾害频仍，中国人民陷于空前未有的苦难之中。一九〇八年（戊申）诗人作《述灾》诗，记述了水患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炎天久不雨，一雨遂泛滥。

三江势俱涨，有地皆水占。

平乡水过屋，高市水入店。

……

灾民露天宿，屡徙常倚担。

生者鹄面立，死者鱼腹殮。

天心夙仁爱，忍使民昏垫？
无家百万人，仰视宁无憾？
虽有泛舟粟，救死亦云暂。
来日良大难，安能久遍贍！
平生愧禹稷，饿溺常在念。
彷徨起中夕，侧目江云暗。

念及灾民流离乞讨的悲惨情景，丘逢甲深感自己济世有心、用武无地，愧疚于无力解救人民的深重苦难。他有一次收到挚友王晓沧带来的“香米”，内心欣喜至极，但捧起做好的喷香米饭，却涌起无限的忧伤：“颇闻被灾处，草木无根皮。不知饥民况，能再支许时？念此不能餐，北望挥泪洟！”（《晓沧惠香米兼以诗贶，赋此为谢，并送之汀州》）诗人远在岭南，但想起徐淮灾民流离失所、剥食树皮的惨象，再香的米饭也难以下咽。这种同情人民疾苦、主张自奉节俭的思想感情，在《诗钞》中时有所见。即使年节喜庆，他也提醒家人，毋忘“满城多少贫儿屋，难过钱荒米贵年”（《除夕示时甫三绝句》）。

朝政昏暗，外患频仍，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处处闻饥复闻乱，年年忧雨更忧晴”（《春尽夜，次韵寄答实甫》），上层统治者却“治河无上策，荒政无完书”（《和晓沧买犊》），在内外反动势力残酷压榨下，人们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越来越多。在荒僻山村，诗人见农家一年辛苦，丰收在望，可是，“鸡犬惊喧官牒下，农忙时节吏催租”（《山村即目》），显然，吏治苛虐、种族压迫是造成民变蜂起、人心浮动的重要原因。在《戊申广州五月五日作》中，诗人明确写道：

年来民穷盗益多，群盗如毛不可拊。

……

民言官苛迫民变，官言革命党为孽。

彼哉革命党曷言，下言政酷上种别，
假大复仇作桀揭。横从海外灌海内，
已近洪流不可绝。……

急剧动荡的民情世态，使诗人预感到这是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奏。他渴望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时代早日到来（《春感》：“莽莽平原郁旱尘，草痕绿浅不成茵；东风吹起懒龙梦，一夜雨声千里春”）。认为维新改良已无补于事（见《济良所》），一盘散沙的世态情状亟需改变。在《晨起书所见》中，诗人借群雀合力驱鸦的生动形象，表达了戮力同心、拯救民族危亡的可贵思想。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党人，正是唤醒民众、复兴中华、倡行民族大义的新兴力量。他们深得人心，其势如滚滚洪流，任何腐败势力也阻遏不了。眼见新思潮、新风尚激励民众，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诗人拍手称快，欣慰作歌（如《赠谢生》、《题陈撷芬女士〈女学报〉》、《送长乐学生入陆军学校》等），热情欢呼“中国睡狮今已醒”的巨大变化。武昌首义成功，丘逢甲闻讯异常激动，欣然命笔赋诗，直接讴歌辛亥革命的胜利：

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
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

如君早解共和义，五百年来国尚存。
万世从今真一系，炎黄华胄主中原。

——《谒明孝陵》

虽然诗人不免从种族革命的角度来理解这次历史变革的意义，但他对封建专制王朝的覆灭、民主共和制的建立，确是表现了衷心的喜悦和乐观明朗的情绪，足证他晚年已由同情和赞成康梁的维新改良转向支持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了。

此外，丘氏吟咏风物、寄情山水之作，也颇有可观。

丘逢甲诗歌的艺术成就与创作风格，清末民初即引起世人注目。近代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称赞丘诗“真天下健者”，梁启超则把丘、黄并提，同推为晚清“诗界革命之巨子”。近代中国侨居新加坡的学者、诗人丘菽园在《诗中八友歌》中写道：

吾家仙根工悲歌，铁骑突出挥金戈；
短衣日暮南山阿，郁勃谁当醉尉呵。

南社中坚、近现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在《论诗六绝句》中说：

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
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

南社诗人潘飞声在《诗中八贤歌》中说：“菽园论诗以余与仲闾（即丘逢甲——引者注）同称，谓丘剑胆，潘琴心。其实仲闾长篇如长枪大剑，武库森严，七律一种开满劲弓，吹裂铁笛，真成义军旧将之诗，余每读靡不心折。”

当代著名的清诗研究专家钱仲联著《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对丘诗也评价甚高。钱氏将黄遵宪、丘逢甲尊奉为“统领近代诗坛”之“诗坛都头领二员”，称赞丘逢甲“是亦诗界革命之魁”，位居第二，有如《水浒传》中的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钱氏还认为丘氏“深到之作，魄力雄厚，情思深挚，人境（人境庐主人，即黄遵宪）亦当缩手”。

上述名家学者的评价悉中肯綮。通观乙未内渡后之丘诗，雄直奔放，慷慨悲壮，沉郁顿挫，字里行间溢散出苍凉激越的英气，处处显现出励人奋进的豪情美。例如“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沉郁雄心久未灰，他年卷土倘重来”，“撑起

东南天半壁，人间还有郑延平”，“安得巨刃摩天扬，手馘长鲸封豺狼”。这类气势纵横，沉郁悲凉的诗句，在丘诗中随处可见。

丘氏的律诗对仗工整，用典精切，五古清新劲健，沉雄博大；而七古则悲慨雄浑，行气如虹，也为“其所自许”（丘菽园语）。如《七洲洋看月放歌》、《送谢四东归》、《题兰史罗浮纪游图》、《东山松石歌和郑生》、《海军衙门歌》、《汕头海关歌》、《述哀，答伯瑶》、《赠谢生》、《二高行》、《赠莫生》、《阮生行》、《欧冶子歌》、《千佛塔歌》、《放歌，次实甫将别岭南韵》等，长篇不少，佳作颇多。如《千佛塔歌》，足与黄遵宪的同题之作媲美，而《放歌，次实甫将别岭南韵》，和章压倒原作，具见诗人功力之深。黄遵宪“颇自负其五古”（钱仲联转引黄遵宪语），而七古则非其所长（梁启超语）。他们各擅胜场，堪称双璧。

丘逢甲的诗除悲壮雄迈，豪放激越这个主旋律之外，也还有清丽婉约的一面。他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那些富有特征性的图景，以洗练、活泼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幅生动明丽的艺术画面，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传达出自己对各种自然美的独特感受。同是岭南深秋景色，在诗人笔下，有的五彩纷呈，格调爽朗，如《秋溪即目》：

绿减蕉阴夜有霜，园柑林柿间丹黄。

扁舟坐爱秋溪晚，七曲屏山半夕阳。

有的本色天籁，浑朴自然，如《山村即目》：

一角西峰夕照中，断云东岭雨濛濛。

林枫欲老柿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

有的小诗含意蕴蓄，耐人寻味，借描绘特定的自然景色，对